

蒋介石和上海资本家的联盟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与虞洽卿及商界的其他头面人物见面，希望获得他们的经济援助，以与武汉政权决裂。资本家们合力给其以支持，以虞洽卿、王震为首组成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的商业、银行业和工业团体在内的商业联合会。

1927年3月27日，虞在商业联合会报告他和蒋介石商谈的情况。两天后商联会的代表团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经济支援。1927年4月1日至4日，商人和银行家垫付了第一笔为数三百万元的短期借款。

然而，蒋介石和资本家的联合很快就宣告结束。他为了获得资金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但是他的要求超过银行家所乐意提供贷款的限度，而且当说服无效时，就用强迫手段去强取硬索。他把原来用于对付工会和共产党的那股恐怖风浪转而用来对付资本家。新闻记者索科尔斯基曾经写道：“各种迫害的方式都在搜捕共产党的借口下使用了出来。许多人被绑架并被迫献出大量的军事贷款，……这种反共的恐怖手段使上海和江苏的人民感受到近代以来绝无仅有的恐惧。”



宋子文与蒋介石在政策上的争执

宋子文在开始实行他的节缩计划和执行部分公债条例上获得成功，当时上海战争还在继续，蒋介石乃按宋的节缩计划办事。然而宋的成就就是短暂的，当对日作战的危险一有减弱，蒋介石计划立刻失去兴趣，上

海战争停止以后，立刻开始增加军费。蒋介石马上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南京政府在消灭共产党威胁之前只是消极抗日。蒋介石认为以迁就政策应付日军是唯一得通的办法，共产党人则是更为重要的敌人。1935年夏天，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准备了浩大的费用，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宋和蒋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争论。

6月6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这时蒋将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调赴福建。蒋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

宋反对调动十九路军，因为他认为这种做法等于公开承认蒋的求和政策。1935年6月6日，宋子文和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虽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亲自至上海劝说宋回任，二三日宋仍坚持他的决心。

与上海资本家 国民政府

1927—1937

[美] 帕克斯·M. 小科布尔◎著
Parks M. Coble, Jr.
蔡静仪◎译

半部民国史，写尽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与斗争
一幅乱世图，再现一代商业精英的崛起与沦落

著名财经作家 李德林 作序推荐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资本家 与国民政府

1927—1937



[美]帕克斯·M. 小科布尔◎著

Parks M. Coble, Jr.

蔡静仪◎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 (美) 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3

书名原文：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ISBN 978-7-5100-9477-4

I. ①上… II. ①小… ②蔡… III. ①资本家—关系—地方政府—研究—上海市—1927—1937 IV. ①D693.71 ②D69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066889 号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Second Edition
by Parks M. Coble, Jr.

Copyright: ©1980, 1986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著 者：[美] 帕克斯·M. 小科布尔

译 者：蔡静仪

策划编辑：陈俞蒨

责任编辑：陈俞蒨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100010 电话：010-64038355)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9

字 数：240千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图字 01-2014-3746

ISBN 978-7-5100-9477-4

定价：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推荐序：一个阶层的速朽

李德林

1927年3月26日，一位不速之客在荷枪实弹的卫队护卫之下，抵达了上海滩巨富虞洽卿的府邸。

虞府上下陷入恐慌之中。虞洽卿将这位不速之客迎入客厅，非常客气地让来客落座后，自己才战战兢兢地坐下。没错，来者是自己的浙江老乡蒋介石，现在的南京国民政府新贵，凭借着北伐的军威成为权倾天下的头面人物。

虞洽卿现在是红极上海滩的浙商领袖，在见蒋介石之前，虞洽卿被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力量吓坏了。在见蒋介石之前，虞洽卿跟国民政府已经有16年的交情。在辛亥革命期间，虞洽卿曾经在上海提供房子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同盟会上海负责人陈其美的安全，捐款给临时政府。

蒋介石一坐下就开门见山，希望虞洽卿能够出面游说上海的名商巨贾们，资助自己跟武汉国民政府决裂，由南京国民政府一统天下。虞洽卿跟蒋介石交情匪浅。1921年，共产党成立的当年，在陈其美的介绍下，虞洽卿跟政治上失意的蒋介石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同事。不过，那个时候，虞洽卿是交易所的老板，蒋介石只是交易所的“红马甲”。

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后，整个上海滩陷入恐慌之中，市场秩序一片混乱。蒋介石走进虞府的那一刻，国民党同共产党在名义上还是政治盟友，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共产党的势力成功地影响着国民党左翼。无论是南京还是武汉将来一统天下，虞洽卿担心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力量会进一步令整个

工商业陷入萧条。虞洽卿希望蒋介石能够保护上海滩的工商业阶层利益。

商人同政治家在上海结盟了。

蒋介石用商人们的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清剿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工会。令虞洽卿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清剿商人们忌惮的共产党势力的过程中，蒋介石担心自己的军队同外国军队发生冲突，暗中同青帮头目杜月笙做了一笔交易。杜月笙的帮会兄弟清剿共产党，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商界迅速地掌握了劳资关系的话语权，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商界从此掉进了另一个陷阱。

青帮是活跃于江浙漕运的秘密组织，蒋介石同杜月笙结盟的一个核心是要控制上海商界。

上海曾经只是两江的一个小县城，鸦片战争之前这里都是毫不起眼的一个小商埠。以广东、福建为首的南方商帮在遭遇战火之后，广州、厦门的国际贸易形势日趋恶化，他们随着国际势力北上，最终在外国人的租界里东山再起。上海逐渐成了国际贸易活跃的港口城市，江浙商帮纷纷离开宁波、杭州、南京、芜湖，涌向上海滩。

各地商帮云集的上海逐渐成了政治集团不容小觑的商业势力。胡雪岩资助湘军领袖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召见这位急公好义的商人，赏穿黄马褂和紫禁城骑马。随后，控制了铁路、轮船、钢铁冶炼、银行、邮政体系的大商人盛宣怀位极人臣。曾经地位卑贱的商人同政治结盟获得了无上的荣耀，以胡雪岩、盛宣怀为首的一批富商巨贾的成功大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商人们。

在满清的最后岁月里，商人们的财富势力逐渐演变成为一个阶层的政治势力。除了胡雪岩、盛宣怀用财富换取官场顶戴这一种形态之外，还有以商业力量联合来左右权力中枢决策。1900年，慈禧太后欲废黜光绪皇帝，另立溥儀为大阿哥，以经元善为首的千名上海商业精英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废黜光绪皇帝。

随后的满清改革过程中，上海的商业精英们逐渐渗透到政治之中，甚至在最后的宪政改革中都拥有相当的话语权。

在商人阶层崛起之前，中国一直是士绅、官僚和皇权之间相互作用，这种稳定的三角政治生态使庞大的基层社会保持着长达两千年的、难以想象的稳定，每一次发生大的动乱，固有的超稳定系统总能快速地进行自我修复。曾经无组织的商业在晚清历经几十年的不断发展，组建形成一个庞大的权势阶层，开始通过谋求政治庇佑商业利益，这种诉求迅速破坏了固有的超稳定系统。

慈禧太后去世的当年，满清的经济状况已经恢复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水平，国际贸易每年出超额高达1.2亿两白银。随着商业越来越发达，商人们需要更大的政治话语权来保护商业利益。上海滩的商人和其他内陆商帮有着更特殊的烙印，他们在寻求国内政治庇佑的同时，同国际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满清宪政改革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公司律》。在预备立宪的议员中，商人已经成了一股拥有政治话语权的典型代表。

辛亥革命是革命党同新生的商业阶层共同作用的革命，作为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拥有商业力量的同时，拥有无法准确评估的政治影响力。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为何在辛亥革命中无法内生修复呢？一直被政治轻贱的商业成为一个阶层后，成了封建体制的外界最重要的破坏力量，导致封建体制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系统无法快速修复，以至于在美国餐厅听闻武昌起义的孙中山当时都对革命的未来相当悲观。

两手空空的孙中山回到上海，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孙中山希望同商业精英们结盟，在南方形成一个有商业支持的新兴政权，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进行讨价还价。非常遗憾，上海的商业掌控在北洋势力手上，那位满清掘墓人盛宣怀的庞大工商产业都成了北洋砧板上的鱼肉。上海商业的精英们最终倒向了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包括那位曾经秘密帮助同盟会的虞洽卿。孙中山的南京

临时政府快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晚清迅速崛起的上海商业精英们很快发现，辛亥革命没有换来商业阶层新的政治话语权，相反最终沦落为北洋集团赌桌上的筹码。以袁世凯、段祺瑞、孙传芳为首的政客们轮番上阵，将上海商业当成了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钱袋子，虞洽卿也是其中的一个倒霉蛋。商人们涌入拥挤不堪的租界，他们希望国际势力能够庇佑他们。

当蒋介石将军的军队挥师北上时，上海滩的商人们一度将北伐军视为可以保护他们的正义政治势力。当北伐军一路北上，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势力令商人们相当忌惮，上海的工会成为无产者向商人们进行劳资谈判的阵地。上海滩的商人们希望蒋介石能够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调整劳资关系。当然，上海滩的商人们跟蒋介石结盟，希望恢复北洋势力夺走的商业阶层政治话语权。

蒋介石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共产党同国民党左翼力量越走越近，已经成为蒋介石天下一统的绊脚石，而自己的军队无法进入租界直接让上海滩的商人们掏腰包。蒋介石只有屈身密会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商人，答应他们清除共产党势力，获得商人们的政治献金。不过，蒋介石的军队无法真正控制租界的商人，蒋介石希望能通过代理人将商业阶层变成南京政府的附庸。

青帮成了蒋介石的代理人，他们庞大的底层组织遍布租界，绑架、勒索是青帮的拿手好戏。蒋介石并不担心同青帮结盟会令未来的局面失控，作为秘密社团组织的青帮，蒋介石随时都能以法治的名义进行铲除。更让蒋介石心安理得的是，清除共产党这种无产阶级政治力量，让青帮这样的社团力量出面，可以保全南京政府在国际外交中的政治颜面，还可以实现政府同上海商人结盟的政治承诺。

蒋介石的一箭双雕给上海滩商人种下了堕落的苦果。

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商人虞洽卿们缺乏政治眼光。共产党只是蒋介石的一

个政治对手，在国民党内，蒋介石也是对手如林。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有着太子的光环，太子党们对政权虎视眈眈。国民党的元老汪精卫从来就没有将蒋介石当成自己的对手，没曾想这个慈溪的小混混居然一步登天。同盟会元老胡汉民也一度成为孙中山接班人的热门人选。文官集团的大佬们都在密谋让蒋介石滚蛋。

北伐提升了蒋介石的威望，文官集团的官僚们并不买账。在军队，将宣统皇帝赶出紫禁城的冯玉祥将军，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学良，尽管他们先后向如日中天的蒋介石信誓旦旦，希望效忠于南京政府，可是他们手上的军队从来就不听从蒋介石的调遣，手握枪杆子的将军们从来就没有将蒋介石放在眼里。

在同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的较量中，蒋介石需要强大的资金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军事地位。蒋介石在南京政府的报告中，也屡次提出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国力，甚至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工商业发展规划，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为了有效地执行政府的决策，蒋介石任用他认为可靠的亲属执掌政府的经济大权。小舅子宋子文、连襟孔祥熙分别管理着财政部和央行这两大经济管控部门。

在蒋介石看来，同青帮结盟后成功控制了上海滩的商人，包括那些躲在租界的富商巨贾们。亲属们只要有计划地执行南京政府的决策，包括上海滩在内的整个国家商业阶层都会成为政府造血的机器。蒋介石甚至希望通过商业的发展来实现现代化，同国际接轨。不过，蒋介石的对手太多，南京政府的财政绝大多数都向军事倾斜，文官集团成为军事集团的勤务兵。蒋介石的先军政治催化了文官集团的腐败。

蒋介石的小舅子、连襟们逐渐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官二代们垄断着国家重要的工商企业，而国有产业经营却一塌糊涂，效率低下，腐败丛生。无论是

小舅子宋子文也好，还是连襟孔祥熙也罢，他们无法通过官二代们经营的垄断产业为蒋介石的军事行动输血，他们只能将手伸向庞大的商业阶层。上海滩的商人们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宋子文毕竟是文官官僚，他希望蒋介石对商人们采取柔性的政治策略。上海滩的商人们把宋子文当成了南京政府正义的政治势力，他们通电国内商业组织，希望联合起来让南京政府解除不合理的国税和省级税收。上海滩的商人们错误地估计了南京政治的局势，蒋介石需要化解文官集团、军事集团的内部矛盾，同共产党决一死战，岂能让宋子文成为商人们眼中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呢？

上海滩的商人们试图通过宋子文来发挥政治上的影响力，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当初不惜跟青帮结盟，就是要完全将商业阶层置于政府的完全掌控之中，岂容商人们对政府的决策说三道四？蒋介石让更具有山西商人特性的孔祥熙对付上海滩的商人们。在经济萧条的艰难时刻，孔祥熙大发公债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商人们的愤怒溢于言表。这正是蒋介石希望看到的结果，孔祥熙一步步将以银行为首的金融工商业企业置于南京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

一个崛起于满清覆亡的新兴阶层，曾经在宪政改革的舞台上拥有相当话语权的商业精英们，在辛亥革命后逐渐沦为政治家们的赌局筹码。尤其是蒋介石北伐成功后，以上海滩为首的商业精英们，在商业和政治的夹缝中疲于奔命，他们既无力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更没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完成商业现代化，他们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高压中，逐渐成了政治的附庸。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完整地再现了蒋介石进入上海之后，上海滩商业阶层的速朽图景。上海滩商人的沉浮是全国商业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新生阶层，崛起于专制时代，终结于专制时代。蒋介石的诡计抑制了商业的正常发展，让南京政府错失了商业现代化的良机。商业成为政府的附庸后，成为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腐败的温床。

在为商业阶层种下苦果的同时，蒋介石为自己的政权种下了苦果。南京政权的大小官僚们，都将商业当成了唐僧肉。蒋介石一度搞“拍苍蝇打老虎”的反腐，可是面对垄断国家资源的那些官二代们，蒋介石的反腐干吏们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海滩的商人们都嘲笑蒋介石的反腐是骗人的把戏，在他们看来，专制政权的反腐败只是回光返照的挣扎而已。蒋介石在他的总统官邸中一声长叹：反腐亡党，不反亡国。

上海商人同蒋介石专制政权的恩怨情仇已是满面尘灰，不过这一段并未远去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商业的游戏规则是，上帝的归上帝，市场的归市场。商业同政治媾和，商人试图赚取权杖上的利润，得之兴旺发达，失之家破人亡。百年的商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权杖上的利润只是一项短暂的交易。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必须要建立政治和商业的防火墙，杜绝商业成为政治的腐败温床，国家的商业现代化才会按照经济的逻辑实现。

是为序！

2014年12月14日 于北京

第二版前言

20世纪70年代撰写本书时，我自觉在书写中国历史上一段已经过去的时代。不论资本主义企业在国民党时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已没有它的一席之地。然而，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在今天似乎比六年前首次出版时更合时宜。1978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经济和政治的剧变。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进程中，政府重新在经济中引入了市场力量，允许存在少量私营企业，甚至准许外国公司重返中国。在国有部门，政府扩大了企业管理者的权限，允许他们自行决定产量和价格，自寻销售渠道，自定工资和奖金，并自留利润。

本书提到的许多资本家（或其子女）东山再起。例如纺织业巨头荣宗敬的儿子荣毅仁^{*}，1949年后留在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营其家族的部分纺织厂。大跃进后，荣毅仁一度失了风头，但邓上台后他也复出，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界的重要人物。

中国今天的经济体制与1949年之前何其相似乃尔，这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工厂管理者的滥权也常常成为中国国内批评改革的焦点：他们任人唯亲，滥用权力发放奖金，营私舞弊。这些指责竟然与20世纪30年代对“官僚

^{*} 荣宗敬实际上是荣毅仁的伯父。荣毅仁的父亲为荣德生，亦为中国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译者注

资本主义”的批评如出一辙。将来或许会有学者比较清末官督商办企业、南京时期的半私营商社和邓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

本书提及的历史问题在学术界引发了一些争论。理查德·布什（Richard C. Bush）不久前就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纺织业资本家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他在文中对我的好几个观点提出了质疑。总体上说，布什认为我低估了纺织业资本家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他认为蒋介石在1927年的确采用了强硬手段，但这一时期的影响被“严重夸大”了。他指出，当时荣宗敬面临被逮捕并没收财产的危险，但他利用与国民党铁杆人物吴稚晖的关系，只买了少量政府债券就安然过关。据布什记载，1934年，荣和其他实业家成功抵制了对面纱加税，吴稚晖的关系再次发挥了一些作用。

不过布什的研究与我的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也承认荣与吴的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点能影响国民党的决策”。布什指出，尽管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政权”，但“掌权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因为商人基本上被排斥在政策制定的核心之外”。

约瑟夫·费乌史密斯（Joseph Fewsmith）的新作在1890年以来上海商业组织的发展背景下探讨商人与政府的关系。他指出1927年的压榨财产风非常重要，但我和布什都没有看到其中的模式。对商人的打击并非随意而为，而是看准了商人圈里的几个群体，清算旧账的同时，也讨好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虞洽卿一派。费乌史密斯在其研究中详细探讨了党国关系的理论，认为蒋介石的胜出意味着国家战胜政党。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30年上海商会的重组。他对这一时期的观点与我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他认为原有的总商会精英是重组的赢家，中下层商人和国民党组织则是输家。他认为经过重组的新商会表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社团主义模式。他依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的理论，认为政府给予商会“法定

的专有权，保证其以代表身份参与决策，以换取商会接受某些行为限制”（施密特语）。

费乌史密斯说，就这样，尽管商会仅仅是上海商界精英的一派，即虞洽卿的那一派，却在1930年获得了独家代表的资格。费乌史密斯认为上海商业界的领头人物并未因此接近权力。威权政府本来就没打算启用社团主义组织，这些组织是用来消除社会动员的。于是，“南京政府时期的商人组织（以及其他中间群体），其作用不是向政府上传舆情、参与国是，而是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

关于南京政府与社会一部分之关系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是布莱德雷·盖瑟特（Bradley Geisert）的博士论文。其研究对象是1924年到1937年间江苏的乡村精英。盖瑟特在其论文中指出，洛伊德·伊斯特曼（Lloyd E. Eastman）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刚愎自用（我在本书结尾也同意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站不住脚。他在《国民党统治多元说初探》一文中生动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大量引用布什的研究成果，指出“城市商业利益集团常常能够有效参与政府决策过程”，“认为国民党统治不考虑商人意愿的观点不能成立”。他说，“商人无数次强迫国民党政权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和意愿。”

盖瑟特因此认为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是多元而不是自用。国民党政权不是一块巨石，而是包含“多个决策节点”，每个节点都受制于不同的外部群体。各种社会力量就这样以复杂的方式对政权施加影响。

《中华民国》1984年2月号就盖瑟特对伊斯特曼的质疑展开了激烈讨论。伊斯特曼仍坚持自己关于国民党社会关系的观点，盖瑟特和费乌史密斯也重申了他们的立场。伊斯特曼认为布什和盖瑟特的证据并不能真正驳倒“自用说”。他承认荣宗敬等资本家有时确如布什所说，能够利用个人关系获取政治利益；地主也确如盖瑟特所说能以其他方式达到这一目的。但伊斯特曼指出，

自用说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外部压力。所谓自用只是说“那些（外部）影响不足以成为政府的责任，也不足以防止政权内的人在统治时以扩大自身权力、地位、财富为首要目的”。

伊斯特曼认为约瑟夫·费乌史密斯以“威权—社团主义政权”总结南京政府很有见地，但终究不完善。他认为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恰恰没有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或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那样的社团主义组织。他认为费乌史密斯在“事实与其先入为主的观点之间穿凿附会”。

综上所述，自本书第一次出版以来，学界对国民党时期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又有了相当多的研究和争论。尽管布什、费乌史密斯和盖瑟特使我们对南京时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我仍然坚持我在第一版所做的结论。当然，确如布什所说，纺织业企业家利用个人关系使政府行为有利于自己。但正如伊斯特曼所言，这种偶一为之的影响并未给政府添加任何制度化的责任。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商人虞洽卿也确如费乌史密斯所说，在其商业对手受到政府打压之时，反而从政府获利。然而我认为费乌史密斯对商会事件的分析并不能服人。其研究的一个缺陷在于，他对商会重组的研究止于1930年，没有全面涉及20世纪30年代商会的角色。我倒认为商会在商业界其实没有多少权力，既不能主张商业利益，也不能作为政府的间接代理压制商业利益。

最后，我不接受盖瑟特的“多元说”。政府中或确有多“决策节点”，但这些“节点”对外部压力能做多少回应呢？资本家对政府政策只有偶然的影响，政府及其行为掌握在蒋介石和军队手里。关于南京时期政府与商界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样的激烈争论无疑还会继续。学者到中国做研究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关于民国时期的研究呈现出爆发态势，新的研究路径也随之出现。例如中国最近出版了1927年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的记录，以及永安百货的档案。将

来或有可能对某一公司进行研究，如永安公司或申新纺织公司，详细研究这些公司的组织、人员、利润和政治关系。如果可以看到会议记录，就有可能研究上海总商会等商业实体的机构历史。这些新研究将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政府与商界的关系。

序 言

在20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的年代中，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子。特别是1895年以后在同西方接触的刺激之下，出现了现代的贸易企业、西式的金融机构和中国人自办的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竞争暂时减弱，为中国现代经济的扩展创造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机会，因而使它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现代经济虽然规模还比较小，但由之而滋生的现代商业阶级，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却是一个具有活力的新因素。

资本家在上海是最强大的，那里已经发展成为现代中国贸易、工业和银行业的中心。在20世纪最初动荡的十多年中，以一批坚韧不拔的领袖人物为首，上海资本家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织，成了上海资本家的机关。当1927年国民党控制上海时，这批资本家成为中国中部重要的政治、经济集团已经有十多年之久了。

1927年春，蒋介石及其同盟者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从此以后，直到1937年夏因日本发动侵略而受挫为止，这十年中它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关于这个时期的南京政府，从30年代起一直到目前为止，一些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认为国民党政权和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是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例如长野在1931年写道：“近来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的影响已经显著增长了。中央政府不取得这些势力的支持就不能存在，……资本家左右着政府

的政策。”¹1933年鲁斯的《幸福》(*Fortune*)杂志说，南京政权主要是建立在和上海银行家联合之上的。²左翼编辑斯潘塞在1934年写道：“改组后的国民党建立在一个新的社会基础——上海银行家和城市的实业、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农村的地主之上。”³巴尼特1941年在一篇为太平洋学会撰写的文章中说，1927年后“一个前进的但反对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给予了执政的国民党重要的激励和支持”⁴。

现今仍有相当多的作者重复着这种论点。穆尔虽然把着重点放在农村地主阶级，但也认为国民党的社会阶级基础是“一部分旧有的统治阶级和城市的新兴分子两者的融合”⁵。外交官朗宁在1974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把南京政府说成蒋的军事将领、陈氏兄弟和“有势力的上海金融和商界人物的联合体”⁶。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一些学者、新闻记者、外交官，还有政治评论家，对国民党政权经常持有这种概念：南京政府同新兴的城市资本家密切联合着，这批资本家和农村地主共同构成了蒋政权的社会基础。这种联合的论点显然认为南京政权代表的主要是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家则能对政府起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本文的论点则是：这两个集团间的关系，事实上其特点是政府极力从政治上使城市资本家俯首听命，并从现代经济中榨取利益。南京政府的政策，所关心的是财政收入而不是资本家的利益或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这种作用加深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软弱地位，并且有利于列强的经济利益。在政治方面，资本家通过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公会所提出的意见，南京政府任意予以抹杀，并且事实上企图把这些组织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资本家作为政治力量是被抑制的，而到1937年他们就成为政府的附庸了。南京政府并不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家也不能在政府决策上发挥重大的政治影响。

然而国民政府并没有蓄意消灭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一直到后